

〔宋〕司马光 著

资治通鉴

国学经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

〔宋〕司马光 著

资治通鉴

薛瑞泽 薛伟泽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著;薛瑞泽,薛伟泽注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7

(国学经典)

ISBN 978-7-5348-3387-8

I. ①资… II. ①司… ②薛… ③薛… III. ①中国 - 古代史 - 编年体 ②资治通鉴 - 注释 ③资治通鉴 - 译文
IV. ①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0761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市智丰印刷厂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28

字数:34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版次: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资治通鉴

司马光与司马迁号称“两司马”，可谓历史天空的两颗耀眼巨星；《资治通鉴》与《史记》皆有第一部通史之称，一为编年体，一为纪传体，千古流传，惠施万代。司马光其人充满传奇，砸缸故事家喻户晓，勤奋好学堪称楷模，秉直刚正气节流芳。《资治通鉴》其书举世瞩目，可谓经典名著，以其精到见解和独特书写风格备受后人喜爱。名人和名著是历史留下的宝贵财富，历久弥新，也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不断的诠释，以故才有了一代又一代的后学对司马光人格光辉的文化解读和对《资治通鉴》深刻寓意的翻新闻释。

一、司马光的生平和政治主张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其父司马池为光山县令，是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生于河南光山。《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传》云：“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这说明司马光从小就聪颖好学，显示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天赋。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三月，司马光举进士甲第，被任命为奉礼郎、华州判官。宝元二年，司马光“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庆历四年（1044），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次年，改任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韦城县事。庆历六年，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迁本寺丞。皇祐元年（1049），枢密副使庞籍举荐司马光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皇祐四年，司马光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书。至和元年（1054），任群牧司判官。同年，庞籍以户部侍郎的身份知郢州事，征辟司马光典学。司马光开始通判郢州事。次年，庞籍被授予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并州事，司马光被庞籍征辟为并州通判。嘉祐二年（1057）六月，司马光改任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次年，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嘉祐五年，迁度支员外郎，判句院。次年，司马光被擢升撰修起居注，同判尚书礼部郎。七月，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于是立志编撰《通志》，作为统治者的借鉴。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撰写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进献宋英宗，他在《进通志表》中云：“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思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伏遇皇帝陛下留意艺文，讲求古训。臣有先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不敢自匿，谨缮写随表上进。”《通志》进上后，“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先后知贡举、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是年十月，司马光请求宋神宗辞去翰林学士一职，专司修史，宋神宗为《资治通鉴》作序，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赐以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熙宁元年（1068）二月，司马光专门写了《谢赐资治通鉴序》。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司马光竭力反对，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宋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神宗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出知永兴军。次年四月，任西京御史台，在洛阳15年，进行《资治通鉴》的编撰。至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成书。司马光升为资政殿学士。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即位，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推翻了王安石变法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执政一年半，是年九月初一，司马光辞世，“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次年正月，葬夏县涑水乡，百姓“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据《宋史》卷二百二至卷二百九《艺文志》所记述，司马光学识渊博，学术造诣颇深，著述宏富。除史学经典《资治通鉴》外，还有经学类著作多种，如《易说》一卷又三卷、《系辞说》二卷、《中庸大学广义》一卷、《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切韵指掌图》一卷、司马光等《六家中庸大学解义》一卷、《三家冠婚丧祭礼》五卷（司马光、程颐、张载定），又《类编》四十四卷等（卷二百二）。与《资治通鉴》同类的编年体史书还有《资治通鉴举要历》八十卷、《通鉴前例》一卷、《稽古录》二十卷、《历年图》六卷、《通鉴节要》六十卷、《帝统编年纪事珠玑》十二卷、《历代累年》二卷。另有故事类《日录》三卷、《涑水记闻》三十二卷等。职官类史书《百官公卿表》十五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官制遗稿》一卷等（卷二百三）。仪注类《书仪》八卷、《家范》一卷以及《宗室世表》三卷（卷二百四）。儒家类《潜虚》一卷、又《文中子传》一卷、《集注四家扬子》十三卷、《集注太玄经》六卷（并《司马光集》）。道家类《老子道德经注》二卷（卷二百

五)。小说类《游山行记》十二卷（卷二百六）。杂艺术类《投壶新格》一卷。医书类《医问》七卷（卷二百七）。总集类《司马光集》八十卷、《绍圣三公诗》三卷（司马光、欧阳修、冯京所著）等。正因为历史上的巨大贡献，司马光与孔子和孟子被奉为儒家三圣。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典型的守旧派。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推行新法，出台了一系列理财、强兵、取士等方面改革措施，以期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而司马光“逆疏其利害”，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对于社会的改革他坚持慎重的态度，认为应当局限在伦理纲常的整顿。最主要是在思想领域内加强儒家思想的教化，而不是社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革。况且治理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苏轼集》卷九十《司马温公行状》）由此可见，在社会积重难返的情况下，改革所面临的种种阻碍。司马光无视北宋社会的矛盾，没有看到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已经“大坏”，当然也无从谈起“更造”了。因此，当王安石变法被废止后，他指责王安石说：“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六）

司马光同时提出为政要善于用人才。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上奏指出：“为政得人则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他建议朝廷官员都应当举荐人才，“莫若使有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野无遗贤矣”。并建议朝廷设十科举士，为朝廷所采纳。（《宋史》卷一百六十《选举志六》）又提出

应选用人才进行理财。“天下钱谷之数，五曹各得支用，户部不知出纳见在，无以量入为出。乞令尚书兼领左、右曹，钱谷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寺监者，并归户部，使尚书周知其数，则利权归一；若选用得人，则天下之财庶几可理。”宋哲宗随即“诏尚书省立法”。（《宋史》卷一百六十三《职官志三》）

在守旧思想的指导下，司马光面对北宋日益严重的边境危机，也以守势为主。他说：“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司马光传》）司马光认为宋朝西边、北边的边境战事源于当时被视为能臣贤吏的高宜和赵滋，应当对朝臣中挑起外交争端、边境战乱的人予以重罚，以正视听。特别是他当政以后，对已经完成的抵御西夏的军事包围，也予以裁撤。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免除“西夏愤怒”和西夏“兴兵犯塞”，以换取双方相安无事。这种守旧思想无疑葬送了王安石变法以后在边境地区所取得的成就。

二、《资治通鉴》的编纂

《资治通鉴》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编年史，其学术意义不言自明，它奠定了司马光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还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全书贯古通今，自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前403）开始，到宋太祖代周（959）为止，前后跨16个朝代，计1362年的历史。全书具体内容包括《周纪》五卷、《秦纪》三卷（这两部分原为他早年所撰著的《通志》内容，后来又进一步加工修改而成）、《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

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等。因为司马光“正统”的封建史学观念，对于非中原地区的封建王朝和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没有设立专门的“纪”加以记述，如三国时期曹魏政权设有《魏纪》，而没有蜀汉政权和孙吴政权的“纪”，其具体历史附在《魏纪》中。当然这种记述也使三国时期的历史浑然一体，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又如南北朝对峙时期，司马光对南朝的封建政权以《宋纪》、《齐纪》、《梁纪》、《陈纪》分别加以记述，而对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封建政权，因为是少数民族所建立，不符合司马光的“正统”观念，所以这些朝代的史实都附在南朝政权的相关史实之下。五代十国特殊的历史演变，大致也因上述原因，出现了五代有纪，十国无纪的现象。

《资治通鉴》的编纂有其独有的特点。作者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将一千余年的历史进行了有序记述，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战国初期至五代这一段历史的发展能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可以说是一部全面而内涵丰富的中国通史。

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19年，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如果加上早期撰写《通志》的时间，其前后花费的时间当更长。长达数十年的孜孜追求，耗尽了司马光的精力，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在编撰《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司马光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支持。《司马光传》中说：“《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以为贤于荀悦《汉纪》，数促使终篇，赐以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资治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真可谓是旁征博引。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其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

别集、碑志等总数不下300种。

作为《资治通鉴》编纂的发起者，司马光首倡该书的编写，并得到宋朝皇帝的大力支持，前后参与编纂的还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上述诸人在学术上也颇有贡献。

刘攽（1023—1089），字贡夫，一作贡父、赣父，号公非，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庆历六年（1046）与其兄刘敞同举进士，“仕州县二十年，始为国子监直讲”。宋神宗熙宁年间，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王安石变法时，刘攽“又尝诤安石书，论新法不便。安石怒摈前过，斥通判泰州，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当时曹州“为盗区，重法不能止”，刘攽在曹州任上采取了不同于前人的做法，“治尚宽平，盗亦衰息”。后来刘攽又先后任开封府判官、京东转运使，“徙知兖、亳二州”，因为赞成变法的吴居厚代为转运使，“能奉行法令，致财赋，乃追坐攽废弛，黜监衡州盐仓”。正因为如此，刘攽有“守道背时之士”之称。宋哲宗年间，曾知襄州，又入为秘书少监，加直龙图阁、知蔡州，数月后，“召拜中书舍人”。元祐二年（1087）正月开始曾与苏辙受诏编辑神宗御制。元祐四年卒。刘攽虽然官场失意，但在学术上贡献颇多，“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宋史》卷三百十九《刘敞传附弟攽传》）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刘攽有《内传国语》十卷、《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刘敞、刘攽、刘奉世）、《汉书刊误》四卷、《五代春秋》一部、《芍药谱》一卷、《三异记》一卷、《刘攽集》六十卷、《经史新义》一部、《诗话》一卷等。刘攽还曾校《北齐书》，并有校勘记留存。（《廿二史劄记》卷九、卷十五）《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经籍考·史编年》云：“《编年纪事》十一卷，晁氏曰：皇朝刘攽因司马温公所撰编次。”

刘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今江西高安）人。宋仁

宗皇祐元年（1049）举进士。调钜鹿主簿、和川令。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在史学上贡献颇多，《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传六·刘恕传》云：

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诤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缪，最为精详。

他曾“著《五代十国纪年》（四十二卷）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氏传》所不载者，为《通鉴外纪》（十卷）”。此外还有《疑年谱》一卷、《通鉴问疑》一卷等。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嘉祐八年（1063）三月，以进士甲科登第。熙宁六年（1073）至洛阳，“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光荐为秘书省正字”。司马光认为他“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后来因为得罪王安石，受到压抑。

司马光与上述几人有着共同的政治主张，又具有勤于学问的精神，共同的志向加上十几年之功，终于修成鸿篇巨制，实乃史学之万幸。《资治通鉴》的编写是分工合作完成的。司马光首先提出提纲，不仅有总的提纲，而且有详细的编年提纲。然后由助手根据情况按时代顺序排列材料形成丛目，再根据材料整理形成长编，最后由司马光修订润色成稿。据记载，长编长达6500多卷，3000多万字。这都是在司马光指导下由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完成，最后由司马光删繁就简，加工润色，成为最终的书稿。司马光还将删减

的材料加以说明，著成《通鉴考异》三十卷；另外，鉴于这一部书涉及的内容浩瀚庞杂，为便于查阅，编者在修史的同时还编写了《通鉴目录》三十卷。

三、《资治通鉴》的特点及评价

《资治通鉴》记事的特点可谓是厚今薄古。据粗略计算，《周纪》五卷记载了战国 147 年（前 403—前 256）的历史，平均每卷约记 30 年；《秦纪》三卷记载了秦代 49 年（前 255—前 207）的历史，平均每卷约记 16 年的历史；《汉纪》六十卷记载了两汉 425 年（前 206—219）的历史，平均每卷约记 7 年的历史；《晋纪》四十卷记载了两晋 154 年（265—419）的历史，平均每卷约记 4 年；《唐纪》八十一卷，记载了唐朝 289 年（618—906）的历史，平均每卷记载 3 年半；五代部分二十九卷仅记载了 52 年（907—959）的历史，平均每卷所记不足 2 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各卷记载的历史年限呈递减趋势，可能是因为时代越远，史料越是贫乏；越是接近当世，史料越是丰富的缘故吧！

《资治通鉴》仿效《史记》在叙事之末加上司马迁的“太史公曰”的体例，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约有 210 条。其中“臣光曰”有 100 多条（含 1 条“臣光言”），有引述前人言论的，有司马光自己评论的；其余 90 条是各家评论。主要有《孟子》、荀卿、扬子《法言》、司马迁、班固、荀悦、陈寿、习凿齿、范晔、裴子野、颜之推、欧阳修等人的论述。其中引用扬子《法言》、班固、裴子野的论述较多，针对《汉纪》所抒发的评论占篇幅最多，其次为《唐纪》。

“臣光曰”的主要内容是司马光对有关国家治乱和君臣之道的评价，应该看做是司马光治国安邦思想的流露。他的论述主要涉及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饱含忧患意识，目的是借古鉴今，以让统治

者能从中有所借鉴。比如在叙述完“商鞅变法”后，司马光评述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卷二《周纪二》）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民心不可欺，人君应取信于民，否则便会出现上下离心，国家败亡的结果。他还对商鞅将议论变法是非的人“尽迁之于边”的做法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以为“商君尤称刻薄”。

又比如唐初李世民经过与隐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斗争，得立为皇太子后，司马光论曰：“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这段话表明了司马光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思想，同时也流露了对诸王内讧的惋惜之情。

可能是由于自古以来反腐倡廉就是统治者所要面临的永恒的政治课题吧，《资治通鉴》极其重视腐败政治的记载。同时它也很重视战争的记载，历史上朝代末期的历次重要战争书中都有描述，并且继承了传统的写法，长于写战争的谋划、准备。另外，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有较为详细的陈述。可以说，《资治通鉴》的史料弥足珍贵。

《资治通鉴》成书以来，历代点评批注者不乏其人，为了更为详细地了解司马光在中国政治史和学术史上的贡献，我们选取宋代

以后君王、大臣以及学者的主要述评加以介绍。封建帝王对此书评价甚高，将其作为治国安邦的必读之书，认为可以通过《资治通鉴》学习治国方略。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二十年（1180）曾经对宰臣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金史》卷七《世宗纪中》）蒙古族接受汉文化后对《资治通鉴》也重视有加，或选译之，或请学者进行讲解，显示出《资治通鉴》独具的感人力量。忽必烈即位后，在战争的闲暇也以《资治通鉴》为学习的必备书籍。中统元年（1260），贾居贞被授中书左右司郎中，“从帝北征，每陈说《资治通鉴》，虽在军中，未尝废书”。（《元史》卷一百五十三《贾居贞传》）忽必烈的嫡子真金在被立为太子后，“每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辄讲论经典，若《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学习治国的经验。（《元史》卷一百十五《裕宗传》）忽必烈至元二十年（1283），江南诸道行台御史大夫相威，“以疾请入觐，进译语《资治通鉴》，帝即以赐东宫经筵讲读”。（《元史》卷一百二十八《相威传》）这仍然是为太子讲读《资治通鉴》，以使其学习。大德元年（1297），元成宗铁穆耳巡幸柳林，命焦养直进《资治通鉴》，“因陈规谏之言”。铁穆耳接受了焦养直的规谏，并因此“诏赐酒及钞万七千五百贯”以示褒奖。（《元史》卷一百六十四《焦养直传》）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四月，“帝以《资治通鉴》载前代兴亡治乱，命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及李孟择其切要者译写以进”。（《元史》卷二十五《仁宗纪二》）这是选择其中对“兴亡治乱”有所借鉴的“切要者”加以选译，以便有所借鉴。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二月，“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遂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复敕右丞相也先铁木儿领

之”。（《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纪一》）泰定四年六月，泰定帝又命“翰林侍讲学士阿鲁威、直学士燕赤等进讲，仍命译《资治通鉴》以进”。这是泰定帝接受大臣的建议，选择人员为太子以及诸王大臣子孙讲授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治国经典。这种现象到明代业已形成制度，中央专门设詹事官员讲解《资治通鉴》等书。朱元璋曾经说：“习闻明知古代帝王之道，身体力行《通鉴》原则。”清代也有为皇太子讲《资治通鉴》的传统，如嘉庆十四年（1809），周系英直上书房，授三阿哥读，嘉庆帝诏令：“不但授读讲习诗文，当教阿哥为人居心以忠厚为本。”周系英“请加授《资治通鉴》，以知古今治乱兴衰之故，悉民间疾苦”，得到嘉庆皇帝的同意。（《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四《周系英传》）

统治者之所以将《资治通鉴》作为治国安邦的必读书目加以重视，是因为《资治通鉴》提供了众多历史借鉴。宋神宗曾经说《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康熙帝曾经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王夫之说：“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赧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曾国藩云：“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若能读些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学